

“北漂”中的上海人

本报记者 陶禹舟

提及文艺界“北漂”，许多人会想起北影厂外聚集的群众演员，或是三里屯酒吧中驻唱的地下乐队。

事实上，各种生存状态的“北漂”都有。诗人、画家、音乐人、演员……他们有的依然努力打拼，期待梦想成真；有的心中渐生挫败，开始计划逃离；有的已功成名就，想起当初艰辛，不胜唏嘘；有的则扎根多年，但忆起家乡，依旧想落叶归根。

这其中，不乏为了自己的梦想，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上海人。他们就如同南来的候鸟，无论在这里打拼多久，浦江之畔始终是心中牵挂之地。

刘金：第十一年，再磨一剑

“曾经，年少的梦还没实现；如今，年华只剩倒影涟漪在水面……第十一年，若不放弃，就再磨一把剑。”《中国好歌曲》第二期节目中，上海姑娘刘金一首《第十一年》，唱出了万千“北漂”的心声。

和许多怀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，刘金最初来北京，只是因为“想去外面闯一闯”：“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奇怪，突然有一天觉得，我想去外面看一看，然后这个念头就止不住了。”2002年8月，刘金背起吉他和行囊，离开生活了25年的上海，独自一人来到北京。

北京有无限机遇，但竞争也激烈无比，十年后的刘金，并未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“北漂”生活的艰辛滋味，更是只有自己才清楚。

十年内，刘金搬了不下二十次家，如今管庄租住的公寓里，依旧摆着各种未拆箱的包裹，“就担心哪天房租涨了，又要搬，干脆不打开了。”她还开了一家淘宝店，以备无人邀约写歌时，变卖“家产”以支撑生活。“我卖过家具、衣服、鞋子，新电脑换成了旧电脑，大 midi（键盘）换成小 midi，最艰苦的时候，为了凑齐500元的房租，连酱油瓶都拿出去卖了。”为了省下车票钱，她也只有春节时才会回上海和家人团聚。



本版制图 董春洁

“北漂”第十一年，刘金终于等到了关注原创音乐的《中国好歌曲》，这位热爱音乐的姑娘将重新起航，向着自己的梦想再度出发。至于未来，她希望能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发展，“最好是能每周都坐高铁回去，多看看父母。”

袁成杰：我的视野会放眼全国

不同于刘金的“心血来潮”，袁成杰来北京前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。那时他已是沪上知名主持人，更何况还有来自家人的不理解。“但我入行是参加‘我型我秀’，心里一直有个音乐梦。”每当迷茫或是低潮时，袁成杰都会问自己，入行的初衷是什么，“每一次的答案都是音乐。如果我老了，回想自己这一辈子，没有大胆地去拼一下音乐梦，会不会自己都觉得后悔。”

2007年，袁成杰毅然放弃了主持人的工作，来到了北京。签约星光国际未满两月，他与戚薇便组成“男才女貌”组合，推出单曲《外滩十八号》。这首歌不仅迅速占据各大音乐排行榜，也让袁成杰在全国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。经过七年发展，如今的他已成为一名影视、歌多栖艺人，不仅出演了多部影视剧，去

年还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。

风光的背后也有辛酸。回忆起初来北京的生活，袁成杰百感交集：“那时兜里只有两千块钱，租房子连押金都不够，经纪人当时又不在北京，只好开口跟朋友借钱，真是人生第一次，特别难为情。”

对于这座打拼几年的城市，袁成杰最大的感触是：“毕竟是文化中心，视角不一样，如果不来北京，可能很难成为全国知名的艺人。”但他认为目光不应局限在某一座城市：“我当初北上就是希望能打开更广的知名度，现在无论是拍戏还是上节目，也基本是全国各地跑。”袁成杰说，无论将来住在哪个城市，自己的视野都会放眼全国。

沈蕙玮：在幕后，默默耕耘

比管庄更远的地方，有一处新建的大稿国际艺术区，影视造型设计师沈蕙玮所属的公司便坐落其中。记者去采访的时候，这位26岁的上海姑娘正在宽敞的工作间里，为一部即将开拍的古装剧搭人物造型。

沈蕙玮决定“北漂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服装和化妆设计专业的

她，一直以来的愿望便是做一名优秀的影视造型设计师：“上海在时尚、广告造型方面处于顶尖水平，但影视服化却不如北京的好。”毕业那一年，在导师推荐下，沈蕙玮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造型师陈敏正创办的瀚正造型。

虽然来北京尚不到4年，沈蕙玮在业内已小有名气，她所参与、负责过造型设计的影视剧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，其中不乏《辛亥革命》、《十月围城》、《甄嬛传》等大作，《武则天》里范冰冰那套惊艳了无数人的红色戏服，上面更有她亲手绣的珠花。

有甜，必然也有苦。沈蕙玮在公司附近租住的公寓，很多时候都处于空置中：“最开始一两年要跟剧组，在片场一呆就是好几个月；现在经常要去昌平的服装厂，住在附近盯着他们打版做戏服。”但对这个乐观的姑娘来说，生活上的苦并不值一提，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才是她目前最专注的事。

不过沈蕙玮也有困惑：“很多戏都在横店或上海拍摄，影视造型公司却大多在北京。上海占据了地理优势，这一行业却不如北京发展得好。”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如果发展机会均等，她还是想回上海。

伊灵：快三十年，感觉还是漂着

如果按来北京的时间长短算，画家伊灵可以算是资深的“北漂”上海人了。

1983年，22岁的伊灵放弃了国棉31厂的工作，离开上海，一个人骑着单车周游了大半个中国。1987年走到北京时，他兴起了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办民族风情山寨的念头，虽想法最终并未实现，但伊灵自此便留在了这个城市。

后来，伊灵与方力钧、丁方等画家一起迁到福缘门村画画，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的中心，这就是后来在艺术界颇具影响力“圆明园画家村”，伊灵被大家推选为第一任村长。

1995年，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，圆明园画家村被迫解散，许多画家迁至宋庄，形成一个新的聚集地。但伊灵来到宋庄，已经是2005年了，“当时宋庄为吸引知名画家来这里，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，比如以极低的价格租给我们地来盖画室。”在宋庄美术馆附近，伊灵带着记者参观了他占地5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，“我一些画家朋友曾经就说，做梦都想有一座这样的画室。”

如今艺术界提及伊灵，总习惯以“北京画家”称之，但伊灵认为自己骨子里还是上海人，“在北京快三十年了，感觉还是‘漂’着。如果有机会我将来肯定会回上海定居，人总是想着落叶归根嘛。”伊灵说，他最大的遗憾是至今还未在上海办过画展，“真想有一天回去办一场，把当年国棉厂的同事都请来，向他们汇报一下我这三十年来在外面做的事情。”

(上接 A14版)

奋斗

阳光舞蹈团：撑过来就是一片天

若论艰苦，阳光歌舞团曾经挨过的黯淡岁月，也许不比罗宇明亮。

“最难的时候团里租了三套两室一厅的老式公房，大家就紧着最大的一个客厅，练功排舞。”阳光舞蹈团团长张新刚告诉记者说，1996年他们受邀来佘山欧罗巴乐园驻场演出，但游乐园两年后经营不善歇业了，“没有演出、没有收入、没有宿舍，但大家不甘心就地解散，都想留在上海，想要闯出一番名堂。”这个黑龙江男人忆起当年的苦日子也很是感慨，“主要是冷，那会儿租的房子便宜也没空调，冬天我们东北人根本扛不住上海的冷，睡觉时候得把被子捂过头，但第二天起来一看鼻头还是红的。”

所幸，怀揣着梦想，他们用踏实和努力，一点一点熬出了头。“那会儿我就坐着57路，从头坐到尾，沿途有四星级、五星级酒店我就拿个本子记下来，然后再从静安寺坐回龙柏，有酒店的那些站就下车，找酒店的经

理发资料。不过，发出去10张名片，能有一个电话打回来就不错了，一般也就是给公司年会跳个开场舞什么的。”但很快，专业出色的阳光舞蹈团在酒店表演时被一个电视台的节目编导相中；又不久，兢兢业业的他们在录制中被更多晚会导演认可；再后来，你几乎能在上海所有的大型演出中看到他们的身影，最忙的时候一天要给电视台的三台节目配舞，连央视路过上海也会慕名找到他们帮忙，“2004年的时候，我们团的工资就比上海歌剧院的舞蹈演员都要高”，张新刚的语气里满是自豪和骄傲。

又10年过去，当很多民营演出团体纷纷倒闭的时候，阳光舞蹈团却已在北京开出了分社，和美国福克斯公司一起搞起了驻场演出，目前拥有50名舞蹈演员和15名杂技演员。张新刚告诉记者，未来计划在上海做一个有“本帮味道”的驻场演出，已经找到了投资方，“喝了那么些年黄浦江的水，我们也不想为这座城市做点实在的事情。”

没有塔底 就没有金字塔

曾经采访过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考试，寒风中那些追梦的脸庞叫人动容；也曾经采访过北影厂门口等戏的群众演员，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下一个王宝强的执拗，有时让人觉得可笑。但我想，“北漂”的魅力或许正在于此——给所有奋斗者梦想的权利，至少让他们看到实现的可能。就好像，德龙、孙郡和阳光歌舞团，融入这座国际化大都市，闯出了一片天地；就好像，李瑶、张恒远和罗宇，正在这里追寻着他们的梦想。

上海这些年做了不少高端文化人才的引进工作，卓有成效。稍有遗憾的是，基层的文艺工作者，或者说那些热爱唱歌和表演的年轻人，却越来越难在这座城市找到机会，证明自己；自主创办的小型文化企业、个人工作室，在大量资源一定程度向国有文化企业倾斜的环境中，也大多发展乏力。没有塔底庞大的从业人员，就无法产生顶尖的领军人物，也就造不起上海文化的金字塔。 孙佳音

